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LILUN YU SHIJIAN YANJIU

郑黔玉◎主编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融媒（9·13）目标动态评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LILUN YU SHIJIAN YANJIU

郑黔玉◎主编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 郑黔玉主编.
-- 贵阳 :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81126-695-5

I . ①中… II . ①郑… III .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
究 IV .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1084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主 编： 郑黔玉
责任编辑： 廖 波
出版发行： 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 贵阳海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11 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 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26-695-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违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 0851-5981027

□主编 / 郑黔玉

□副主编 / 曾宪灵 杨成兰 徐晓方 孙绍军 韩贞习

目 录

导 论	001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	001
二、当代中国的主题和基本问题	013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017
四、学习本课程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022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	024
第一节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024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031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042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058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制度	058
第二节 加快形成新的发展方式	071
第三节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079
第四节 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087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093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制度	093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103
第三节 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	109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	115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127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和制度	127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133
第三节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136
第四节 增强文化整体实力与竞争力	148
第五节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153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161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与制度	161
第二节 保障和改善民生	173
第三节 统筹协调社会利益关系	178
第四节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187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192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制度	192
第二节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202
第三节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208
第四节 积极应对环境问题的挑战	211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	221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221
第二节 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新考验新课题	228
第三节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233
第八章 当代中国与世界	244
第一节 当今世界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244
第二节 当代中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251
第三节 中国的国际战略与对外方针政策	256
第四节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262
参考文献	269
后记	273

导 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党就以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己任；改革开放以来，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成立至今的不懈追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基本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透视和剖析，从逻辑上对未来社会做出了一系列推测和设想。这些科学设想，为后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先导。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倾其一生，都在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并试图探索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途径、方式和方法。具体来说，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构想包括两个部分：即作为主体思想的西方社会理论和作为补充思想的东方社会理论。所谓西方社会理论，主要以英、法、德三国为背景，是马克思早、中期关于欧洲，特别是关于西欧的历史发展与现实资本主义状况以及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

全面系统的理论。其主要代表作是《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所谓东方社会理论，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理论而言的，主要以占全世界人口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东方世界为背景，特别是以印度、俄国、中国三国为典型，是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现实社会状况以及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与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西方社会理论不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没有大部头著作，其主要思想散见于马克思研究印度、俄国和中国的文章、通信以及《资本论》和晚期的《人类学笔记》中。然而，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社会合理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是关于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构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更替的思想观点发展到晚期发生变化的标志，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精华。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并不意味着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一样的，都要经历每一相同的阶段。而正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世界各国发展的差异性，某些国家或一些国家可以出现跳越其中的某一阶段而直接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马克思第一次表述了俄国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发展道路的思想是在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他指出，不应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括成社会一般发展的历史，因为“极其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①1881年，在致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维·伊·查苏里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提出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他指出：“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②1882年1月，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指出：“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页。

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探讨东方社会发展之路。1894年1月，恩格斯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的长篇文章，系统阐发了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恩格斯指出：“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并指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②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关于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抽象理论问题变成前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缩短资本主义发展行程的具体现实问题。除此之外，恩格斯晚年在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封书信中，还创造性地提出历史发展表现为“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的新论断。在恩格斯看来，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的；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上层建筑的诸因素如阶级斗争、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等也影响历史进程并决定斗争的形式。因此，要从各种因素的相互结合中把握历史变革的动因。

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所揭示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才能出现的社会主义前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到了东方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甚至是前资本主义状态的国家，从而把社会主义变成全人类共同趋向的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理论先导。

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 20世纪初年，列宁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启发下，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著名的“一国胜利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而且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印证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正确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页。

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及其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二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试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这一政策在战后却引起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不得不停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逐步形成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一是认为在落后国家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存在着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二是明确指出：“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①即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三是提出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列宁认为，不向资本主义学习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他还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即“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②四是认为在生产力落后且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状况下，俄国必须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利用市场和商业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③这些适合俄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对其他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及其弊端 列宁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内部对于苏联的前途，即在欧洲革命处于低潮的国际形势下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十分激烈。斯大林坚定地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不仅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而且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比较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由于过早地停止执行“新经济政策”等原因，最终形成了一种以高度集中统一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即“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建立的前提，是否定、或者说是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从而形成一个与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相左的模式。从1928年开始，在苏联共产党内爆发了斯大林同布哈林之间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继续坚持列宁的“新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302页。

②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382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0页。

经济政策”。1928年8月，布哈林在谈到同斯大林的分歧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及基础是市场关系的存在。他坚决主张在坚持“新经济政策”的前提下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市场关系，发展货币经济。而斯大林在争论中则声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已经过时了，市场和货币经济已经不适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1929年12月，他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结论”中讲道：“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列宁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认真而长期的。但他从来没有说过，新经济政策的施行是永久的。”^①

“斯大林模式”所体现出来的弊端的根源就在于它没有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并导致了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及列宁新经济政策这些创造性思想的背离，导致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绝对化的错误，违背了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从毛泽东晚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邓小平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许多挫折之后，终于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所提供的正确思路上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及列宁的新贡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先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9年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以及走过的弯路、犯过的错误、遭受的损失、得到的教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①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目标，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果：

一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实现步骤。毛泽东率先提出并初步规划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即“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②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又提出国防现代化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③在三届人大上，周恩来正式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在实现步骤上，提出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二是关于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和方针。毛泽东认为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中国的工业化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经验，要正确处理农、轻、重三者的关系，从中国国情出发，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农并举的工业化道路。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设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其中包括工业和农业并举、

^① 胡锦涛：《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4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并举，等等。1959年，毛泽东又针对“大跃进”中片面发展钢铁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提出了安排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的思想。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又进而指出：“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①总之，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必须使农业能够得到和工业相适应的发展，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也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比价。在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三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阶段、经济体制以及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方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第一次明确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从认识论上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依据。毛泽东还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

毛泽东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②认为我国正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提出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观点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识是有启发性的。

毛泽东指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③“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440页。

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①这些认识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前提。

毛泽东主张计划经济，但不赞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 1956 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认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中央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因此，“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②而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还主张中央部门和地方各级企业，也都要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有一定的自治权，中央向地方放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毛泽东认为，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关于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他在 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要求。在 1959 年底至 1960 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他又谈到：“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③1960 年 3 月，在转发中共鞍山市委一份报告的批示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问题，并称之为“鞍钢宪法”。

在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新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问题上，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后期上海出现“地下工厂”的情况，毛泽东在 1956 年 12 月 7 日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上海出现地下工厂是“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又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这叫“新经济政策”。^④

①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 ~ 32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5 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0 页。

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认为中国不搞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实行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轮流执政体制，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毛泽东提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逐步健全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强调坚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还提出要防止国家领导人成为特殊阶层，防止领导机关的特殊化、官僚化。提出“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总目标。

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①认为只有实行这一方针，才能促进我国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继承和吸收我国过去和外国一切有益的科学文化知识。毛泽东还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他认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在对待外国文化的问题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而“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②

在执政党建设方面，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强调必须从思想理论、工作作风、艰苦奋斗、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反对腐败等方面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早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③

在对外关系方面，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运用到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把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放在第一位，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倡导和奉行和平共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处五项原则，坚决主张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的干涉。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形成的这些积极的思想成果，是把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努力结合起来的思想结晶，因而理所当然地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和继承下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教训 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创造，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但是，他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形态，有的还没有形成全党的共识，有的即使写进了党的文件，也没有最终贯彻到底，后来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第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人民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八大提出的这一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正确路线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从1957年开始的反“右”斗争，以及后来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直接造成国家的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

第二，必须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用强制专政的办法解决，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而且着重指出，革命时期那种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这一思想在实践中没有贯彻下去。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种用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给整个国家、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使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工作遭到了极大破坏。

第三，必须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防止个人专断。由于我们党是通过革命的

方式夺取政权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方式还自觉不自觉地带有革命时期的痕迹。那就是凸显领导权威，领导决策一切事务。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由于建设任务本身的繁重复杂，又加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客观上要求党实施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出现的决策失误。因此必须实行长久的稳定的领导体制，而不能把全部权力都集中到一两个领导人身上。但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全党和全国弥漫着个人崇拜气氛，导致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不能得到全党的有力抵制，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第四，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关于历史发展“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新路已经找到，那就是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这无疑是正确的，它表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但是只有民主而没有法治，既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巩固，也不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安定，甚至也不能保证民主本身。尽管在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制定了“五四宪法”和其他少数法律，但主要是为阶级斗争和革命秩序服务的。在中共“八大”也曾提出过健全法制的思想。但在1957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法治逐渐被人治所代替，产生了党大于法，领导人的讲话就是法的现象。尤其是在“文革”时期所出现的打着“大民主”旗号的无法无天的群众运动，打乱了生产、生活的所有秩序，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就是没有法治的民主所导致的悲剧。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法治建设可以说是一项根本性建设，这是我们总结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得出的重要教训。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前无古人的，既有初探的成功，也有失误的磨难。他的成功，显示了这种探索的价值；他的失误，印证了这种探索的艰辛。这些经验和教训，都为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功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①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